

吐峪沟石窟新出文书所见唐代寺院及其活动^①

徐伟 夏立栋

内容提要：吐峪沟石窟新出文书中发现了八个唐代寺院名，除丁谷寺外，其余七个寺院皆为外来寺院，寺院的人数规模一般在十至二十人之间。吐峪沟石窟以清幽的环境为外来寺院僧人提供了每年禅修和结夏的活动场所，外来僧人自备物资，并参与修造供禅修的禅窟，因而吐峪沟石窟是一个多寺院共同活动的公共神圣空间，与城内寺院拥挤嘈杂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世俗性与神圣性的功能互补。在这一背景下，吐峪沟出现了本土僧人与外来僧人的矛盾，丁谷寺则具有一定的管理外来僧人的权限。与外来僧人禅修、结夏活动有所不同的是，文书所体现的丁谷寺更倾向于经济和斋醮等活动。

关键词：唐代 吐峪沟石窟 丁谷寺 寺院活动

中图分类号：B9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 (2026) 02—0087—13

DOI: 10.16363/j.cnki.xyyj.2026.02.008

高昌及唐西州时期的寺院一直是吐鲁番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一般将吐鲁番地区的寺院整体上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的重点主要聚焦于寺院经济、制度、日常生活、政府对寺院的管理等方面，^②基本上都属于宏观层面的考察。限于材料，具体微观层面的考察相对少见，比较有代表

- ①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2024 年度重大招标项目“新疆鄯善县吐峪沟石窟考古发掘报告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 24VLS004)、2025 年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吐鲁番学研究院吐峪沟出土文书研究团队项目“吐峪沟石窟出土文书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 25VJXT022) 的阶段性成果。
- ② 从整体上对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寺院进行研究的有严耀中《魏氏高昌王国寺院研究》(《文史》第 34 辑, 中华书局, 1992 年), 小田义久《西州佛寺攷》(《龍谷史壇》第 93、94 号, 1989 年)。从专题对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寺院进行的研究, 体现在寺院经济方面的论文有谢重光《魏氏高昌寺院经济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 第 45~62 页), 吴震《寺院经济在高昌社会中的地位》(《新疆文物》1990 年第 4 期, 第 100~110 页), 张重洲《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21 年)等; 寺院制度方面的论文有王素《高昌至西州寺院三纲制度的演变》(《敦煌学辑刊》1985 年第 2 期, 第 79~83 页)等; 日常生活方面的论文有〔日〕小笠原宣秀《吐鲁番出土の宗教生活文书》(《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下)》(西域文化研究 3), 京都法藏馆, 1960 年)、季爱民《唐代西州僧尼的社会生活》(《西域研究》2007 年第 4 期, 第 63~73 页)等; 政府对寺院管理方面的论文有姚崇新《试论高昌国的佛教与佛教教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4 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第 39~71 页), 孟宪实《论唐朝的佛教管理——以僧籍的编造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09 年第 3 期, 第 136~143 页)等。总体来说, 高昌时期寺院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要略强于西州时期。

性的是町田隆吉对马寺的个案考察,^①再就是近年围绕吐峪沟丁谷寺的个案考察。^②笔者 2025 年参与了对吐峪沟新出文书的整理工作,发现新出文书绝大部分为唐代寺院文书,其中除佛经外,其余文书涉及了寺院活动的方方面面,并出现了除丁谷寺外的数个寺院名,这些寺院是否与丁谷寺一样为吐峪沟本土寺院?这些寺院名为什么会出现于吐峪沟石窟所出的文书中?文书所载寺院活动与这些寺院又为何种关系?弄清这几个问题是合理解读这批寺院文书的一把钥匙,也正是本文拟加以初步探讨的问题。

一 吐峪沟石窟新出文书所见唐代寺院及规模

在已刊的出土地点为吐峪沟的各种文献中,提及的寺院有丁谷寺和开觉寺,如柳洪亮先生《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一书所收文书《唐西州下宁戎、丁谷等寺帖为供车牛事》出土于吐峪沟石窟千佛洞,就记载了西州下帖文要求丁谷寺提供车牛一事。^③吐峪沟东区北部僧坊窟第 42 窟的小禅室留存有汉文题记“开觉寺僧智空”。在新出的吐峪沟文书中,还记载了其他几个寺院。例如出土于吐峪沟沟东北部的文书《张令寺文书残片》(编号: 24-007-14: a) 仅为一条形的小纸片,上书“蒲昌县张令寺”,^④其所载张令寺还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所收阿斯塔那九九号墓文书《高昌延寿某年勘合行马、亭马表后》(编号: 68TAM99: 5/4 (a))^⑤、《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所收三八八号墓文书《高昌付张团儿等银钱帐》(编号: 86TAM388: 21-1)。^⑥根据新出文书,我们可知张令寺在蒲昌县,并由麹氏高昌时期一直存续到了唐代。

除了张令寺,新出吐峪沟文书还记载了圣像院、等爱寺、七德寺、遵戒寺及崇宝寺。圣像院与等爱寺同见出土于吐峪沟靠南崖草层东的文书残片《圣像院等寺僧数帐》(编号: TLF14837)^⑦,文书载:

1 案俾

2 禅院一十六人 圣像院一十三人 等爱寺一十一人

圣像院仅见于该文书,而等爱寺则还见载于《吐鲁番出土文书》所收阿斯塔那二四〇号墓文书《唐供丁夫等食料帐》(编号: TAM240: 1/2—2 (a))^⑧和《大谷文书集成》所收《西州高昌县

① (日) 町田隆吉 《唐西州马寺小考——八世纪后半の一尼寺の寺院经济をめぐって》,《驹泽史学》第 45 号,1993 年,第 167~194 页。

② 近几年关于丁谷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丁谷的含义进行研究,如朱玉麒《吐鲁番丁谷山文献疏证》(《吐鲁番学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61~71 页);二是对丁谷寺的系统研究,如谢慧娴《吐鲁番文书中的“丁谷寺”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2024 年第 23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 年,第 57~73 页)。

③ 柳洪亮 《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23 页。

④ 此片文书编号是吐峪沟新出文书整理小组的临时编号,按出土收集的包命名,该编号就是第 24 包中第 7 袋之第 14 件 a 面。

⑤ 唐长孺 《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 壹,文物出版社,1992 年,第 439 页。

⑥ 柳洪亮 《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第 74 页。

⑦ 此片文书编号为吐鲁番市博物馆馆藏临时编号,TLF 即吐鲁番,下同。

⑧ 唐长孺 《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 肆,文物出版社,1996 年,第 49 页。

佃人文书》^①，以及《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所收俄藏文书《唐西州等爱寺状为差科事》^②、辽宁档案馆藏文书《唐西州诸寺法师禅师名簿》^③。

七德寺，见于吐峪沟护坡墙下堆积层出土的文书残片《唐七德寺僧某状上寺主为谘斋次第及勾当柴草等事》（编号：TLF14919）所载：

- 1 十一月廿五日七德寺
 - 2 几前
 - 3 谨寺主
 - 4 ☐ 人不别状惠当师随状附千万问。如斋有次第，请谁一
 - 5 谨谘寺主，前者所许柴一两车，在屯柴草并 ☐
 - 6 ☐ 处，其柴请谁早与勾当
 - 7 回与寺
- （后缺）

又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所收阿斯塔那五一〇号墓文书《唐庭州西海县横管状为七德寺僧妄理人事》（编号：73TAM510: 03）^④。

遵戒寺，见于吐峪沟靠南崖草层东的文书残片《唐遵戒寺僧澄真等为当寺少粮事牒》（编号：TLF14888: a），文书载：

- 1 遵戒寺僧澄真 僧智空 弟子宋怀惠 驴壹头
 - 2 牒澄真为当院徒众之少粮食，今将前件人
- （后缺）

又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所收阿斯塔那五〇九号墓文书《唐西州高昌县出草帐》（编号：73TAM509: 24 (a)），具载如下：

- 1 阙文哲肆束半 张达子肆束半 张多举（鼠）柒束 赵永安肆束半
- 2 赵洛贞叁束半 范龙才壹束 张通仁肆束半 赵文忠拾束半
- 3 魏孝忠柒束 刘和德拾肆束 成嘉礼柒束 柒束
- 4 龙兴观柒束 大 寺叁束半 崇宝寺拾肆束
- 5 龙兴寺贰拾肆束 遵戒寺贰拾壹束 柒束^⑤

该文书所载为高昌县向龙兴观、大 寺、崇宝寺、龙兴寺、遵戒寺、证圣寺、开觉寺等寺及百姓征草之事，其中的崇宝寺也见载于吐峪沟新出文书残片《唐崇宝寺僧昙润致镇西开元寺二禅师书》（编号：031-46）如下：

- 1 崇宝寺沙门昙润 状至镇西开元寺 ☐ 嵩愕二禅师 通送

崇宝寺还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所收《唐申报崇宝寺某人身死牒》，^⑥《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

① [日] 小田义久：《大谷文书集成》（壹），法藏馆，1984年，第87页。

② 荣新江，史睿主编：《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中华书局，2021年，第556页。

③ 荣新江，史睿主编：《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第557页。

④ 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肆，第344页。

⑤ 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肆，第262页。

⑥ 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肆，第38页。

所收德国国家图书馆藏文书《唐交河郡安西坊配田亩历》、普林斯顿大学藏文书《唐西州僧敬先牒为请僧为亡妣七七追福事》。^①

以上新出文书所记载的寺院，以及这些文书出土于吐峪沟的事实，说明这些寺院与吐峪沟可能存在某种联系。除此之外，新出文书还揭示了这些寺院人数规模的线索，^②如上引吐峪沟新出文书残片《圣像院等寺僧数帐》（编号：TLF14837）所载某禅院人数十六人、圣像院十三人、等爱寺十一人，就给出了三个寺院的人数，这应该是统计寺院人数的籍帐类文书。另据文书《唐神龙三年（七〇七）正月西州高昌县开觉等寺手实》载：

- 15 开觉寺
16 合当寺新旧总管僧总廿人
17 五人杂破除
18 人身死

（后缺）^③

关于该文书前 14 行，孟宪实先生认为属于另一寺院的手实内容，第 15 行及以下为开觉寺的手实内容，^④可以看出开觉寺在籍僧人总共为二十人。又据《唐西州高昌县弘宝寺僧及奴婢名籍二》（编号：64TAM15：21）载：

- 1 僧惠 ☐ 僧
2 惠润 僧胜
3 真匠 僧智太 僧惠儒
4 明进 僧惠益 僧太觉
5 僧昙进 僧海相 僧善觉
6 十五人 大奴买得 奴祀得
7 奴駟子合大小奴六人 大婢 ☐
8 婢虎女 婢致是 婢 ☐ ☐ ^⑤

可以看出弘宝寺是将僧人与奴婢分别统计的，僧人的人数为十五人。又据吐鲁番博物馆藏《贞元六年造窟功德记》第 11 行载“僧七人常居于此”，^⑥宁戎寺有僧七人常居，再加上在外活动的僧人数人，因而该寺可能也有十数人。丁谷寺与宁戎寺都处狭长山谷地带，且地理环境、空间及布局相近，很有可能人数规模也相近。综上，我们可以大致认为西州单个寺院僧人数量规模一般是在十至二十人之间。

① 荣新江，史睿主编《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第 531、558 页。

② 王祥伟《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世俗政权对西州寺院经济的管制》（《吐鲁番学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54~62 页）一文涉及世俗政权对西州寺院僧侣规模限制的讨论，但还未具体到揭示寺院具体人数规模的层面。

③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 年，第 53 页。

④ 孟宪实《论唐朝的佛教管理——以僧籍的编造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09 年第 3 期，第 141 页。

⑤ 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贰，文物出版社，1994 年，第 31 页。

⑥ 夏立栋《〈贞元六年造窟功德记〉与唐西州宁戎窟寺》，《敦煌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19 页。

二 吐峪沟石窟新出文书所见寺院的土客关系

町田隆吉先生认为从麹氏高昌至唐代西州，寺院不完全统计有 200 座，包含了麹氏高昌时期和西州时期吐鲁番地区寺院数量的总和。^① 姚崇新先生则认为高昌国时期的寺院不低于 165 所，文书所见西州寺院不足 40 所。^② 按《宋史·高昌传》载王延德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出使高昌回鹘，回朝后报告其所见高昌“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③，据此可知在回鹘高昌时期仍保留的唐朝寺院仍有至少 50 余所，这也可以由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所载西州寺院名得到印证，为勾勒西州寺院的大致图景，并便于后文讨论，现将各种文书中提及的西州寺院名勾稽如下表：

文书编号	大谷 1248	大谷 1418	大谷 2371	大谷 2372	大谷 2373
寺院名	普明	西塔	等爱、弘宝	□寿	妙德
文书编号	大谷 2378	大谷 2604	大谷 2845	大谷 2846	大谷 2872
寺院名	万	追永	桓王	慧灯	焦
文书编号	大谷 2994	大谷 3364	大谷 3376	大谷 3475	大谷 3514
寺院名	诗?	万寿、□路	崇宝	招福	永安、索
文书编号	大谷 3752	大谷 4044	大谷 8136	Дх. 1523	SH. 072
寺院名	冯	崇福	龙兴	丁谷	普照
文书编号	SH. 169-1	Kr. 4/654r	SH. 126-1	SH. 177 下 1	Ch 1046r
寺院名	救厄	斯越磨	郎中、南塔、左	真容	崇宝、董
文书编号或页码	64TAM15: 16	67TAM78: 30	Peald le (C. 068)	73TAM206: 42/10—8	《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p. 557
寺院名	康	白、王	崇宝、□度、妙德合、玄觉	观音	追福、崇福、万寿、普光、开觉、普照、等爱、证圣、励勤、法施、大宝
文书编号	72TAM150: 39	73TAM210: 136/2	69TKM39: 9/9 (a)	65TAM42: 87	73TAM509: 24 (a) + (b)
寺院名	白、高	家令	曹	陈	大宝、崇宝、龙兴、遵戒、证圣、开觉、□元、普昭、静虑、崇圣
文书编号	72TAM188: 59	72TAM188: 61	73TAM222: 56/1	73TAM518: 2/3—3	64TAM35: 20
寺院名	西窟	崇宝	昭福	永隆	张
文书编号	67TAM363: 8—2 (a)	72TAM189: 62	68TAM105: 9 (a)	73TAM506: 07	TLF14837

① (日) 町田隆吉 《吐鲁番出土文书に見える仏教寺院名について—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ノート》，《东京学芸大学附属高等学校大泉校舍研究纪要》第 15 集，1990 年，第 38 页。

② 姚崇新 《试论高昌国的佛教与佛教教团》，季羨林、饶宗颐等主编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4 卷，第 67 页。

③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传》，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4112 页。

寺院名	静虑、宁戎、玄觉、开觉	斫羯	崛	马	圣像、等爱
文书编号或页码	24-007-14: a	TLF14919	《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p. 393		
寺院名	张令	七德	七级、西塔		

上表中共计 65 个寺名，超过了姚崇新先生所估计的不足 40 所。由于吐鲁番出土文书分散的特殊性，在搜检文书时很难做到悉数全收，因而唐代西州寺院的实际数量可能还要超过这个数量。在王延德出使的北宋太平兴国年间，高昌的唐代寺院应该已荒废了一部分，其在高昌看到的 50 余所应该是存留下来的部分。

由上文可知，吐峪沟出土文书中已发现丁谷、开觉、张令、圣像、等爱、七德、遵戒及崇宝等八个寺院名，占上表所勾稽全西州寺名数量的八分之一，这可以说明在唐代，吐峪沟是佛教活动兴盛的区域，各寺院的僧人与之产生各种联系、互动。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除丁谷寺可确定为吐峪沟寺院外，其他七个寺院名虽见于吐峪沟所出文书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为吐峪沟寺院，那么这几个寺院与吐峪沟的关系就成为需要讨论的问题。

关于开觉寺，谢慧娴径直认为是在高昌城内，并根据《唐西州高昌县出草帐》《唐景龙四年卜天寿抄〈十二月新三台词〉及诸五言诗》《唐神龙三年正月西州高昌县开觉寺等寺手实》等文书，揭示出开觉寺规模较大，且设有寺学，这些都很有见解。^① 但关于开觉寺在高昌城内的结论，还可以作进一步论证，因为也不能否定其有在高昌城外的可能性。据《唐西州高昌县出草帐》载：

- 4 龙兴观柒束 大[宝]寺叁束半 崇宝寺拾肆束
- 5 龙兴寺贰拾肆束半 遵戒寺贰拾壹束 []柒束
- 6 证圣寺贰拾壹束 开觉寺叁拾伍束 索善端叁束^②

开觉寺出草三十五束，崇宝寺出草十四束，遵戒寺出草二十一束，三者列于同一征收名单，很有可能隶属于同一辖区。由上文可知，崇宝寺也见于吐峪沟所出文书，据《唐交河郡安西坊配田亩历》载：

- 1 安西坊
- 2 四月廿一日康日进下壹段 []
- 3 崇宝寺又壹段 董寺家 []^③

可以看出崇宝寺位于高昌城内安西坊，那么开觉寺和遵戒寺很有可能也是在高昌城内。再观与这三寺同列出草名单的龙兴观、龙兴寺，按《唐会要》载，神龙元年二月，经右补阙张景源上疏，中宗下诏“其天下大唐中兴寺观，宜改为龙兴寺观。诸如此例，并即令改”。^④ 可以看出龙兴观、龙兴寺为代表的官方寺观，具有很浓厚的官方象征性，应该也是设置在高昌城内的。还

① 谢慧娴 《吐鲁番文书中的“丁谷寺”及其相关问题研究》，郝春文主编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23 卷，第 66 页。

② 唐长孺 《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肆，第 262 页。

③ 荣新江，史睿主编 《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第 531 页。

④ 《宋》王溥 《唐会要》卷四八《龙兴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992～993 页。

有同列出草名单的证圣寺，可能与武则天改元证圣相关，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因而《出草帐》的征收对象可能是高昌城内的百姓和寺院。

在基本确定崇宝寺，以及大致推断开觉寺、遵戒寺在高昌城内后，还有张令寺、圣像院、七德寺及等爱寺需要确定与吐峪沟的关系。张令寺由前文可知，属蒲昌县。圣像院因仅见于吐峪沟新出文书，缺乏其他文献参照，故无法确定其归属。七德寺据前引文书《唐庭州西海县横管状为七德寺僧妄理人事》称“西州七德寺僧”，也缺乏其他参照文献，因而也很难确定其归属。至于等爱寺，据文书《唐西州诸寺法师禅师名簿》载，等爱寺与开觉寺、证圣寺等寺并列，^①说明其可能也在高昌城内。因而在除丁谷寺以外的七个寺院中，除圣像院和七德寺，其他五个寺院大致可以推断是在高昌城内。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吐峪沟石窟出土文书中还是丁谷寺的出现次数最多，并且出土于吐峪沟石窟的不同地点。如上文提及的《唐西州下宁戎、丁谷等寺帖为供车牛事》出土于吐峪沟石窟，新出文书《唐惠琮上丁谷窟阁梨状封题》（编号：TLF14887）出土于吐峪沟靠南崖处草层中部，新出文书《唐某年丁谷寺状为欠去年天山军枣果等事》（编号：TLF14915）出土于吐峪沟护坡墙下堆积，这说明丁谷寺在吐峪沟石窟的涵盖范围较广，可能在之后随着发掘范围的扩大，不同地点还会出现丁谷寺文书，因而我们可以合理推断丁谷寺的寺院范围涵盖了整个吐峪沟。又按《西州图经》载：

- 39 丁谷窟有寺一所并有禅院一所
40 右在柳中县界至北山廿五里丁谷中西
41 去州廿里寺其依山构揆巘疏阶雁塔^②

所谓“丁谷”应该就是吐峪沟，“有寺一所”指明吐峪沟只有一所寺即丁谷寺，从《图经》只描述“寺”来看，“禅院”可能是附属于“寺”的。又按《西州志》残卷载：

- 1 岩高 [] 涧流清丛林蓊郁 []
2 西边且有丁谷寺伴一院 []
3 右传闻多出圣名僧宿德所 []^③

与《图经》记载一致，也指明吐峪沟有丁谷寺一所。因而《西州图经》《西州志》的记载，可与由丁谷寺文书出土地点所得出的丁谷寺院涵盖吐峪沟的推断相互印证。

综上所述，在吐峪沟文书所见的八个寺院中，丁谷寺为吐峪沟本土唯一寺院，其余七个都为外来寺院，其中张令寺属蒲昌县，崇宝、开觉、遵戒、等爱等寺大致可确定属高昌城内，七德、圣像二寺虽难确定所属，但也可以确定非吐峪沟寺院。问题在于，吐峪沟有何吸引力，能使外来寺院纷纷对其趋之若鹜。

三 文书所见外来寺院在吐峪沟的活动

前文专门利用各种文书勾稽出西州寺院 65 所，而这很有可能还只是实际寺院数量的一部分，

① 荣新江，史睿主编《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第 557 页。

②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年，第 55 页。

③ 荣新江，史睿主编《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第 142 页。

因而高昌城内的寺院密度应该很大。如前引《唐交河郡安西坊配田亩历》残卷载，高昌城内一坊就有崇宝寺、董寺及紫极宫，又据《唐开元四年（公元七一六年）玄觉寺婢三胜除附牒》（编号：72TAM188：58/1）载：

- 6 安西坊
- 7 玄觉寺婢三胜
- 8 右依检上件寺
- 9 牒件状如前谨牒 ①

可见玄觉寺也属安西坊。安西坊一坊之地就至少有三佛寺、一道观，由此可以看出高昌城内佛教势力大于道教，也可以看到佛寺的密度要大于道观。因而就会出现如文书《唐质库帐历（？）》（编号：73TAM206：42/10—8）所载：

- 1 何七娘正月十八日取陆拾伍文
- 2 二月一日赎付母米去
- 3 观音寺后曲年十三②

居民何七娘与佛寺观音寺相邻。这种拥挤且与市井为邻的情况，显然不利于清净的禅修。上引《西州图经》《西州志》残卷皆突出记载了吐峪沟环境的清幽，尤其是《西州志》在描述吐峪沟环境“岩高 涧流清丛林蓊郁”后，又接着记载“右传闻多出圣名僧宿德”，显然在当时人看来，吐峪沟的清幽环境与产生名僧宿德具有一定的因果关联，是适合禅修之地，仅在吐峪沟东区北侧就发现了洞窟 56 个，③ 在洞窟内两侧一般会有用于观禅后坐禅的小窟，这也是吐峪沟石窟相较于其他地区石窟较为特殊的地方。④

由前文可知，丁谷寺僧的人数规模可能为十至二十之间，如果只是供本寺僧使用，没有必要开凿这么多洞窟，并且石窟的开凿历经麹氏高昌至高昌回鹘时期的数百年，⑤ 因而吐峪沟石窟很有可能是历代虔心佛教的供养人，以及历代外来寺院僧人来吐峪沟后，为禅修方便而陆续修造。如吐鲁番博物馆收藏的《贞元六年造窟功德记》第 4、5 行载：

- 4 宁圣 晋 令 ，西州人也。七岁落发，廿
- 5 开一窟，以为法华精舍。誓心诵持，期满⑥

西州某人七岁出家落发，二十几岁开凿一窟，以作为自己禅修的“法华精舍”。如前文已述及的吐峪沟东区北部僧坊窟第 42 窟的小禅室，有比丘坐禅图及汉文题记“开觉寺僧智空”，开

① 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肆，第 35 页。

② 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贰，第 330 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龟兹研究院《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东区北侧石窟发掘简报》，《考古》2012 年第 1 期，第 8 页。据吐鲁番学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最新调查统计，吐峪沟发现的历代开凿石窟数量已达 157 个。

④ 关于吐峪沟石窟观禅的相关研究，可参〔日〕山部能宜，陈瑞莲《吐峪沟第 42 窟禅观壁画研究——兼及汉文禅观文献的起源》（《敦煌研究》2015 年第 4 期，第 35～42 页），夏立栋《石窟空间与仪式秩序：重建吐峪沟东区第 30～32 窟禅观程序》（《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 年第 4 期，第 20～34 页）等。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鄯善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20 年第 3 期，第 458～459 页。

⑥ 夏立栋《〈贞元六年造窟功德记〉与唐西州宁戎窟寺》，《敦煌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19 页。

觉寺由前文可知为高昌城内寺院，寺僧智空就是由高昌城到吐峪沟，其在第 42 窟内小禅室内题名，说明这个禅室的开凿可能与其有关，或由其供养。再如吐峪沟靠南崖处草层东新出文书《僧某语惠照等请粮状》（编号：TLF14856：a）载：

- 1 语惠照等：吾昆欲此处，独柳中
- 2 复畏吾畏
- 3 明府施多少粮食，见送刹窟，上
- 4 应相吾畏
- 5 可更容一两人，汝与宝藏即作来
- 6 论

僧人某可能是来吐峪沟的外地僧人，而惠照等应该就是其在沟外的同寺僧人。“见送刹窟”说明僧某在吐峪沟某窟中禅修，其与惠照等通信，就是为了让他们将柳中县令施舍的粮食送到吐峪沟。既然在吐峪沟禅修粮食需要自给，那么僧某禅修的禅窟很有可能也是自造。除了粮食，其他生活物资也需要布施，如吐峪沟新出文书《僧某请施酱酢等物状》（编号：031-77）载：

- 1 今缘酱 酢 场?
- 2 师许施 酢一斗亦请同臻（臻）是所望也
- 3 盐 往取进心愿

僧人某向施主请求施舍酱、酢、盐等生活物品。又按文书《唐西州丁谷僧惠静状为诉僧义玄打骂诬陷事》载：

- 1 丁谷僧义玄
- 2 右惠静自往山居早经五年粮食米面铛锅
- 3 氈簟一切家具皆从县下将往窟所无何

僧人惠静为外来僧人，并已在吐峪沟禅修五年，粮食、米面、铛锅、氈簟等一切生活物资皆由沟外县域携带来窟所，也就是他禅修的窟室。又按吐峪沟新出文书《僧某请纸书状》（编号：GS04：104）载：

- 5 阁梨法前
- 6 此缘抄写少多文书要纸
- 7 望阁梨勾当好纸一

僧某写信向沟外其他寺院僧人请求纸张，以用于抄写佛经。可见在吐峪沟的僧人需要向沟外的州县索取各种物资，这可能与吐峪沟的地理环境有关，吐峪沟是一条狭长的山谷，水沟两侧即沟东、沟西是较为陡峭的山体，石窟就建于两侧山体上，吐峪沟应该是缺乏农业生产空间的，再加之外来僧人的不断涌入，物资供应的压力可想而知。因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功能性互动，即吐峪沟为沟外寺院提供公共的禅修空间功能，而沟外的州县则为吐峪沟供应必需的物资。结夏作为禅修的一种形式，显然也可以纳入这种互动过程中来理解。

关于结夏，谢慧娴依据文书《唐丁谷某寺惠净与弟书（草）》中“惠净且在丁谷坐夏”的记载，并以《贞元六年造窟功德记》的记载作为旁证，合理论证了丁谷寺是西州僧人每年结夏的场所。根据吐峪沟新出文书及其他相关记载，这个结论还可以作进一步补充。以崇宝寺僧昙润为例，按上引吐峪沟新出的《唐崇宝寺僧昙润致镇西开元寺二禅师书》（编号：031-16）载：

1 崇宝寺沙门昙润[状]至镇西开元寺□□□二禅师[院]送

这是一封崇宝寺僧人昙润与镇西寺僧人通信的书信，由前文可知，崇宝寺属高昌城内安西坊，而这封书信出土于吐峪沟，则说明这封信可能是昙润在吐峪沟所写。又据吐峪沟新出文书《僧人昙润与都督书》（编号：CS4：106）载：

- 1 子将麴濯至，奉书问及，不胜
- 2 慰沃实深。秋初尚热，惟
- 3 都督远涉疲顿，动止万福
- 4 昙润滥居山谷，是事无堪，忽
- 5 蒙垂问，实增愧悚。每年尝有虫来，兼励成中，徒众不白。昙润法门
- 6 有限，未暇参奉，但增驰慕，
- 7 无任展对。谨因使回，奉状不尽

这是崇宝寺僧昙润与某都督的书信，从“滥居山谷”“秋初尚热”来看，昙润应该是在吐峪沟结夏，刚结束夏天，进入秋天。而“每年尝有虫来”，说明昙润应该是每年都会过来结夏。又据吐峪沟新出文书《某年五月廿五日比丘普净致乐师书状》（编号：TLF14896a）载：

- 1 季夏[极]热，伏惟
- 2 乐师□胜常已否，普净在此山门，特□有
- 3 限，[未]委任相看，更劳书信不绝，但忆壹日朝
- 4 □，意间无任忧情，不胜起委，但以师望，承事
- 5 二亲，志德努力，莫越诸人，普净在于山门[处]
- 6 得不忧虑，状望照知，忽有忧末之会，应相□。
- 7 五月廿五日比丘普净通问
- 8 同书委问法荣师兄 法前
- 9 同学师弟归壹且通委
- 10 问山门无□不且（具）一一

从“普净在此山门”可以看出，比丘普净应该是吐峪沟的外来僧人。“季夏极热”说明普净应该是来吐峪沟结夏。这封信就是他在吐峪沟结夏时给乐师及师兄弟的问候。由这些书信可以看出，每年确实有来自不同寺院的僧人来吐峪沟结夏。通书信说明这种结夏不是封闭的，僧人在结夏时还是会与外界进行互动，以维护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

四 新出文书所见丁谷寺活动补考

《西州图经》记载了丁谷和宁戎两所寺院，二者相距不远，且都是山谷型窟寺，但由于吐峪沟出土了相对较多的丁谷寺相关文书，因而丁谷寺引发了更多的关注，谢慧娴《吐鲁番文书中的“丁谷寺”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是目前关于丁谷寺最系统的研究，其中“丁谷寺与世俗社会的互动”部分，着重对文书所见麴氏高昌至唐丁谷寺与官府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与民间的法律纠纷问题进行了揭示。由于新文书的出土，又有数件文书与丁谷寺相关，其内容也为之前丁谷寺文书所未见，可以对丁谷寺的活动作进一步的补充，丰富我们对丁谷寺的了解。现以新出文书

为纲，对丁谷寺的活动作补充论述如下。

据吐峪沟新出靠南崖草层中部的文书《唐惠琮上丁谷窟阁梨状封题》(编号: TLF14887) 载:

- 1 ☐ 谨 阁梨 ☐ 惠琮状上封
 2 状至西州丁谷窟通上律阁梨^{玉讳润}
 3 ☐ 谨 阁梨^{几前} ☐ 惠琮状上封

这封书信应该是僧人惠琮寄到丁谷寺，然后由丁谷寺“通”上律阁梨，即转交上律阁梨“玉讳润”，“玉讳”应该是名讳的尊称，这种用法在道教经典里面比较常见，如《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符图》载“此诸天帝玉讳，皆以赤晶之玉，碧字刻之。”^①“上律”说明僧人某润可能是主修戒律的律师。僧人惠琮寄信给身在吐峪沟的僧人某润，还需丁谷寺转达，这也充分说明了丁谷寺是吐峪沟具有管理职能的本土寺院，外来僧人的活动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其管理。

《西州图经》仅载“山窟二院”，丁谷寺即其一，具有西州少有的可供外来僧人禅修和结夏的区位优势。外来僧人的涌入，就有可能激发本土僧人与外来僧人的矛盾，如《唐西州丁谷僧惠静状为诉僧义玄打骂诬陷事》载:

- 1 丁谷僧义玄
 2 右惠静自往山居，早经五年，粮食、米面、铛锅、
 3 氍毹，一切家具皆从县下将往窟所。无何，
 4 乃被前件僧打骂，道^清等具见。惠静陈
 5 状，今见推问，因兹乃[□]加诬，口云当房及
 6 诸窟所度失脱，及志丁谷尸罗等数人
 7 通款。诸窟及当房不曾有失脱，据伊妒
 8 害，伤煞亦能。其义玄丁谷一切材木梨脯，
 9 去年十一月廿日夜般两车送入州城，惠静
 10 共数人具见，尚自不论，却被罗(织)云，一切^②

从文书看，矛盾的起因是丁谷寺义玄、尸罗等本土僧人，认为外来僧人惠静与“当房及诸窟所度失脱”有关，即认为惠静有盗窃嫌疑，并对其进行殴打。而惠静则自陈“粮食、米面、铛锅、氍毹，一切家具皆从县下将往窟所”，指出自己所需物品都是自备，没有盗窃的必要和动机。同时惠静为了反击，指出反而是义玄自己监守自盗，“其义玄丁谷一切材木梨脯，去年十一月廿日夜般两车送入州城”，将丁谷寺的财物搬入州城，丁谷寺僧义玄在高昌城内应该有宅邸，如文书《僧法安等寺宅簿》(编号: 59TAM302: 32/2) 载:

- 1 ☐ 师法安有寺一，☐
 2 ☐ 有寺一，城外宅一，赵师☐

① (宋) 宋徽宗 《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符图》，载《道藏》第3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0072b页。

② 荣新江，史睿主编《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第559页。

3 师明信有寺一，赵 ①

高昌城内寺院的僧人在城外有宅，那么丁谷寺的僧人在城内有宅也不足为怪。总而言之，丁谷寺僧义玄与外来僧人惠静的矛盾焦点就是寺院窟所财物及其他资源的支配权，本土僧人害怕外来僧人侵占丁谷寺的财物或资源。这种冲突应该不是个例，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那么在这一背景下，丁谷寺维持对外来僧人一定程度的管理，显然也是有必要的。

上引文书《唐西州丁谷僧惠静状为诉僧义玄打骂诬陷事》不仅揭示了丁谷寺本土僧人和外来僧人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其“其义玄丁谷一切材木梨脯”的记载对于我们了解唐代吐峪沟的物产也颇具价值。前文已论述过吐峪沟缺乏农业生产的空间，僧人多缺粮的情况，这份文书又记载“材木梨脯”，这说明吐峪沟应该不产粮，而主要产出木材和果品。再如吐峪沟护坡墙下堆积中新发现的文书《唐某年丁谷寺状为欠去年天山军枣果等事》(编号: TLF14915) 载:

1 丁谷寺 状上
2 欠去年天山军
3 右寺家
4 枣果不
5 勒

西州的天山军，按刘安志《唐代西州天山军的成立》一文考证，应该是在开元十五年(727)以后，^② 因而这份丁谷寺的状文年代应该是在开元十五年后。关于丁谷寺与政府层面的互动，已有学者指出丁谷寺为政府养马或提供车牛，如前引文书《唐西州下宁戎、丁谷等寺帖为供车牛事》，是西州政府向丁谷寺征用车牛。而这一份状文是为丁谷寺欠天山军枣果之事，如大谷三四七五号文书《西州岸头府到来文书》载:

4 为配流人等、并诸县流移人等、帖到常日申事。仓曹符、为康虔福等欠官枣、限五日(内送事)。^③

可见丁谷寺欠天山军的应该就是官枣，这说明除西州外，天山军可能对丁谷寺也有经济征收的权力，其向丁谷寺征收枣果，也进一步证实吐峪沟的主要物产就是各种果品。

以上两片新见文书都与经济相关，而第三片新见文书则是一篇发愿文，定名为《丁谷寺僧发愿文》(编号: GS1: 004 (2))，按文书载:

1 仰后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灵祇今
2 此丁谷伽蓝所众僧就此神庙
3 转(?) 读大乘金光明妙典所生
4 福先用庄严诸神祇等愿使
5 威光自(?) 奏乐来听觉(?)
6 向明(?) 国界令(?)
7 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贼徒
8 退散国土通同慈心向相亦愿

① 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 贰, 第 193 页。

② 刘安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11 年, 第 221 页。

③ (日) 小田义久《大谷文书集成》(贰), 第 106 页。

从“就此神庙”来看，丁谷寺的僧人应该是到其他寺庙参加斋醮活动，在活动上转读《金光明经》。1965年在吐鲁番安乐城废佛塔中也出土了《金光明经》卷二题记，一般认为是北凉时期在高昌郡的粟特人为家庭祈福而作。^①这也反映出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胡汉民族皆信奉《金光明经》的历史事实。又如敦煌写本 S. 1963《金光明最胜王经》末尾抄经人祈愿文载“为身陷在异番，敬写《金光明经》一卷。唯愿两国通和，兵甲休息”，丁谷寺僧转经时的愿文“祸乱不作、贼徒退散”与此祈愿文意旨类似，因而丁谷寺僧转读的《金光明经》很有可能也是《金光明最胜王经》。丁谷寺僧很有可能是遇到了敌人兵临城下的危急状况，这或许是唐贞元年间西州沦陷前情形的一种反映。

五 结语

通过上文论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认识。之前在各种吐鲁番出土文书中零散出现了一些唐代寺院，但由于文书出土地点多不明，导致寺院多缺乏明确的地域背景。吐峪沟新出文书出现的一批寺院，与吐峪沟建立了地域联系。本文勾稽出唐西州寺院⁶⁵所，吐峪沟新出文书所见寺院就占八所，可见吐峪沟是西州佛教活动兴盛的区域。

八所寺院中除丁谷寺为吐峪沟本土寺院外，其余皆为外来寺院，但外来寺院深度参与了吐峪沟的各种佛教活动，他们自备资粮到吐峪沟禅修、结夏，并为了方便禅修而自费开凿禅窟，吐峪沟石窟的开凿除各种供养人外，外来禅修僧人也是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因而我们可以看出吐峪沟在唐代是众多寺院共同活动的公共区域。吐峪沟因具备城内所缺的清幽雅致环境，为沟外的寺院僧人提供禅修、结夏等活动的场所，而吐峪沟必备的各种物资则多由沟外寺院或州县提供，因而吐峪沟与沟外的寺院就形成了一种功能性的互动。

丁谷寺作为吐峪沟本土寺院，自然是吐峪沟佛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出文书中涉及丁谷寺的文书也远多于其他寺院，涉及了与官府相关的经济活动，以及斋醮活动等。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丁谷寺作为本土寺院，对于吐峪沟还具备一定的管理职能，如外来僧人的信件互动需要通过丁谷寺的转达，而吐峪沟存在的本土僧人与外来僧人的客观矛盾，也需要丁谷寺具备一定的管理权限。

至此，我们也可以对文首的问题作一定程度的回应，吐峪沟新出文书中的寺院除丁谷寺外，其余皆为外来寺院。新出文书中涉及的各种寺院活动，其活动主体应该就是丁谷寺及来吐峪沟从事禅修、结夏等活动的外来寺院。当然，本文只是抛砖引玉，吐峪沟新出文书体量巨大，涉及的寺院活动类型非常丰富，例如寺院内僧人的具体日常活动，如斋戒、礼拜、日常管理及各种经济活动等，都有待进一步深入揭示，这也是这批文书整理与研究工作的下一阶段的一个重要方向。

（作者单位：徐伟 长江大学历史系；

夏立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文洲

责任校对：陈霞

^①〔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84页。

Abstract: As a famous historical site in Buddhist history, Mount Gośṛṅga (*Niu-jiao Shan* 牛角山) in Khotan serves as a vivid example of the Sinicisation of Buddhism. It is also the site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Khotan manuscript *Dharmapada*. However, the precis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Dharmapada*'s discovery require further detailed investigation. Based on insights from recent field surveys, and relevant historical records and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this paper meticulously examines the related records in explorers' reports and the accounts of Mount Gośṛṅga in Buddhist scriptures. It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unt Kohmari and its caves on the banks of the Karakash River, and Mount Gośṛṅga and its stone chambe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location of the Kohmari caves is indeed the Mount Gośṛṅga mentioned in Buddhist texts, and its caves were meditation caves (*dhyāna* caves) that utilised natural grottos. The *Dharmapada* originated from this very cave. All of this demonstrates the antiquity of Khotanese Buddhism and its early connections with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The early *saṅghārāmas* of Khotan likely emerged at the foot of the Kunlun Mountains, in the area between the two rivers.

Keywords: Khotan; Kohmari Caves; Mount Gośṛṅga; Kharoṣṭhī script; *Dharmapada*

Potteries and related issues from the Mohuchahan cemetery in Hejing, Xinjiang
Chen Ting, Chen Ling (52)

Major achievements of archaeological work at the satellite burial area of the Jianjiapo mortuary complex in Yiwu, Xinjiang (2022-2023) Xi Tongyuan, Zhou Xinyan (72)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case file concerning the punishment of Mao Xiaobao for stealing official wheat in a certain county of Jiaoke Commandery in the 13th year of the *Tian-bao* (天宝) era of the Tang Dynasty(754) Wang Shenglin, She Xiuhong (78)

Tang dynasty monasteries and their activities as seen in the newly discovered manuscripts from the Toyuq Grottoes Xu Wei, Xia Lidong (87)

Abstract: Eight Tang dynasty monastery names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the newly discovered manuscripts from the Toyuq Grottoes. Apart from the Dinggu Monastery, the other seven were all non-local monasteries, generally accommodating between ten and twenty individuals. The serene environment of the Toyuq Grottoes provided a venue for non-local monks to engage in their annual meditation and summer retreat (*vassa*). These visiting monks brought their own supplies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tation caves. Consequently, the Toyuq Grottoes served as a public sacred space shared by multiple monasteries, standing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crowded and noisy environment of the monasteries within the city walls. This in turn provides a functional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the secular and the sacred worlds to a certain extent. Against this backdrop, conflicts arose between local and non-local monks at Toyuq, and the Dinggu Monastery held a certain degree of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over the visiting monks. Different from the meditation and summer retreat activities of the non-local monks, the documents indicate that the Dinggu Monastery was more inclined toward economic pursuits and ritual offerings.

Keywords: Tang Dynasty; Toyuq Grottoes; Dinggu Monastery; Monastic Activities

Research on the newly discovered block-printed Buddhist scriptures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from Turfan Chen Yuzhen, Xu Weizhe (100)

Three newly acquired Old Uyghur manuscripts and the Manichaean Community at Toyuq Fu Ma, Xia Lidong, Wang Long (109)

Abstract: Academic consensus has established that the Bezeklik Grottoes were occupied and modified by the Manichaean community during the early Uyghur period, which also contained the residence for senior bishops. Although no definitive Manichaean caves were identified at the equally renowned Toyuq Grottoes, documents unearthed in earlier years have hinted at traces of Manichaean activities.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further provided conclusive evidence for this inference. Scientific excavations reveal that Manichaean texts have been unearthed from multiple caves at Toyuq, indicating a widespread distribution of Manichaean followers. Notably, internal correspondence of the Manichaean community found at the newly discovered ruins of Monastery No. 2 in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the valley proves that this Buddhist site was once occupied by Manichaeans. At the same time, official documents of the *Xizhou* Uyghur Kingdom unearthed from the caves in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the valley further corroborate the presence of a state-sponsored local Manichaean monastic community. Together, these newly unearthed